



Qiu Dingfan

邱定蕃 有色金属冶金专家。1941年10月10日出生于香港，江西省广昌县人。1962年毕业于南昌大学。1990年赴加拿大皇后大学学习和研究。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原副院长。长期从事有色金属冶金研究与开发工作。发明矿浆电解新工艺，实现了金属的一步提取。主持“高冰镍湿法精炼新工艺”研究，在新疆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加压浸出镍精炼厂。研究成功了萃取分离重金属镍、钴新工艺，并首次实现工业化。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16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及十余项省部级成果奖。先后获光华工程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发表论文110篇，出版学术专著3本。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感 恩

每一个人，从他开始懂事到他长大成人，都有一些异常深刻的事件，永远留在他的脑海中。其中有一些，对他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有的可能还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特别是在十七八岁以前，留下的印象更是一生难以磨灭。

1941年10月，我出生在香港。就在父母按当地风俗高高兴兴地庆祝我的满月几天后，

日本鬼子轰炸了香港。父亲看着我两个年幼的哥哥，和我这个襁褓中的婴儿，焦虑万分。毫无人性的日本飞机向手无寸铁的香港居民投下了一颗又一颗的炸弹，死伤人数越来越多。父亲毅然舍去了他多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一点财产，拖家带口，加入了逃难的人群。父亲一手拉着8岁的大哥，一手拉着4岁的二哥，母亲怀抱着刚满月的我，不知道历经了多少磨难，总算死里逃生，回到了父亲的故乡——江西省广昌县贯桥村。

父亲是个小商人，他在离贯桥村20里地的赤水镇与朋友合伙开了个布店。父亲为人诚实、大度，还有些豪放，在小镇上口碑极好。他经常资助贯桥村和周围的一些贫困乡亲，看到他们冬天没有寒衣，他会请他们到店里来免费扯上一些布，让他们做一件棉衣；父亲在中医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他的医术，在小镇和周围地区，颇有名气。不仅是熟人找他看病，许多不认识的人也慕名前来。他开药方，病人再去药店抓药。父亲看病从不收钱，对特别穷苦的人，他还免费送一些药。当“文化大革命”极“左”风暴席卷这个小镇时，他和镇上的许多商人一样，受到了冲击。有人要他交出“藏”起来的金银财宝，实际上他拥有的一点财产早已被人抄光。当时，我在远隔几千里之外的云南五七干校劳动，两个哥哥也已下放农村。因此，父母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就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有人趁着黑夜，从门缝中给父母送来了最宝贵的生活费；有人在门口放下了生活必需品转身离去，至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我和哥哥们猜想，一定是那些过去曾经得到过父母照顾的人，帮助两个老人渡过了难关。

童年时代，我常听到父母回忆那段逃难的经历。父亲告诉我们，国家不强大，人民就遭殃。他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还告诫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家乡和乡亲。他曾说：你看，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家乡和乡亲们收留了我们。父亲的许多看法和做法，对我有很深

的影响。1990年,当我结束了在加拿大的学习和研究之后,面对一些诱惑,没有能动摇我按时回国工作的决心。父亲的教导,我牢记在心。

母亲是我一生中最崇敬的人,也是我一生欠“债”最多的人。在她逝世后的三十多年中,我仍会经常梦见她。母亲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苦难造就了她许多高尚的品德。她的勤劳、忍让和善良,赢得了邻居和乡亲们的尊重。她一生没有和任何人有过矛盾,从未与别人发生过争执。她常说,多做善事,终将好报。她只认得很少的几个字,但对我和哥哥们的读书,却全力支持。即使在家庭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也不让我们分心。她把乡亲们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贯桥村的许多村民,遇到什么难事,也愿意跟她商量。每逢阴历初五初十,是赤水镇的圩日,周围的村民们都来小镇赶圩,这一天便是我们家最热闹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中午饭至少有两桌,贯桥村来赶圩的乡亲们,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大都在我家吃饭。圩日的中饭往往比平日要好,平日里不常见到的肉菜,在这一天一般是会出现的。个别人如果当天没有办完事,还会留下来住一宿。自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乡亲们为了回报母亲,每逢过年或过节时,我们便有吃不完的粉干、糍粑和粽子。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才不得不停止。

1974年,母亲在北京与我共同生活了三年之后逝世,我将她的骨灰捧回老家贯桥村安葬,村里上百人自发为母亲送葬。村委会为她在村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宣读了村文书所写的催人泪下的祭文,文中历数了母亲为村民们所做的许多善事和好事。母亲地下有知,也会感激乡亲们的深情厚谊。

母亲一生信佛、拜佛,有时也将节省下来的一点钱捐给寺庙。受她的影响,从童年到青年,我对上天和神明也一直抱有强烈的崇敬感和神秘感,有时也跟随母亲到寺庙对菩萨顶礼膜拜。

但是,经历了母亲的病逝,我打碎了神的枷锁,对神的崇敬荡然无存。由于常年劳动,母亲身体一直不错,但她过瘦,抵抗力弱,一次肺炎发烧四天竟夺去了她的生命。在她病重住院期间的一天深夜,我曾跪在床边对天发誓:“如果真如世人所说,人的寿命由阴间阎罗决定,请神明延长母亲的寿命,我愿用自己的寿命抵扣。母亲一生善良,对佛祖又如此虔诚,她不该在66岁时就离开我们。请上天保佑母亲渡过难关。”但是,母亲在几天后仍然离去。从此,我不再信佛,去寺庙从不向菩萨低头,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无神论者。

母亲的品行,使她获得了邻里乡亲的普遍敬佩,对我的成长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在科研工作中的勤奋和执著,在团队中的合作和友善,就得益于母亲的言传和身教。

我的大哥在中学时成绩非常好,常常是全班第一名。他酷爱物理,他曾告诉我,准备高考时报考北大物理系。在我们兄弟中,他的成绩最好。1955年,在他高中毕业前夕,被查出患有肺结核病,这在当时是考生们最害怕的事情。自然,他失去了这一年参加高考的资格。大哥回家养病,母亲尽心照料。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大哥在县林业局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准备养好病后继续报考大学,去实现他的梦想。1957年,我在高考体检时也被查出肺病,虽暂时让我进了考场,但那实际上仅是对几位心情极度低落学生的一点安慰。之后的一年里,我每日坚持锻炼,离家不远的一座几百米高的山峰便是我的活动场所。清晨,我从山下向山顶跑去;傍晚,我在山边小河游泳。当再次体检时,我已完全合格。但是,在我离家去赣州参加高考前夕,父亲十分无奈地对我说:孩子,我一生都支持你们读书,但现在我太老了,没有了工作,全家靠你大哥每月33元的工资生活,你二哥在大学期间由于同情右派也失去了工作机会,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父亲的话让我潸然泪下,我多么盼望能上大学,但我也不能对家庭的困境熟视无

睹。我对父亲说,好吧,我不去考了,我去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哥来到了我的身边,他斩钉截铁地既对我又对父亲说,弟弟的成绩好,他必须去考,家里的事有我,不管多困难,我们也能挺过去。大哥的口气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父亲点点头。第二天,我含泪离家去赶考。大哥的一句话,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也使他上大学的梦想彻底破灭。这就是一个兄长的高尚情怀。当我刚进大学时,收到大哥的一封信,他除了一些祝贺和鼓励的话之外,特别写了一句:“不要急于求成,也不遇难退却。”大学期间,我将这句话写在所有的书本扉页上,用来激励自己。这句话,也成为我几十年从事科研工作的座右铭。

我经常想起那些教过我的老师,而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周启明先生和数学老师黄浴先生,却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周老师教语文与众不同,他特别强调朗读,每节课他都要找几个同学站起来朗读一段课文,请全班同学指出朗读中的错误,什么地方加了字,什么地方少了字,逗号和句号的语气上是否表现出来了,等等。他要求我们写作文要精练,不要废话。他给作文的最高分是“简而明”。当有同学看到自己的作文批有“简而明”时,毫无疑问,下一节课这篇作文就会当作范文来宣读。我有幸得过几次这样的最高奖赏。周先生让我明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最高境界。在我担任领导工作之后,我对自己的要求之一是,讲话不要啰嗦,文章不要又臭又长,简明扼要,抓住重点。黄先生教数学深受同学欢迎,但他又是全校有名的暴脾气,同学们都怕他。也许是我比同班同学小三四岁的缘故,也许是我数学成绩一向

较好,黄先生从未对我发过脾气。同学们大都认为,黄老师偏爱我。为了培养学生们快速计算的能力,他规定考试时首先交卷的同学可多加5分,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自然都参与这一竞争。一次,我得意地抢先将数学试卷交给了黄先生,他满脸堆笑,还拍了拍我的头以示夸奖。但是,不到一分钟,他的脸色晴转阴,非常气愤地说,你看看,这道题错了,没有做对就抢先交卷,你是个笨蛋!你是个饭桶!下课后,他拽着我到办公室去,拍着桌子大发雷霆,数落了一大堆我有的或没有的缺点,骄傲、了不起、自以为聪明、偷懒、愚蠢、不好好听讲……足足训了半个小时,让我在同学面前大为丢脸,回寝室大哭一场。那一年,我才11岁,初中二年级。我一生都忘不了黄先生那顿训斥,他让我明白:谨慎、细心、严密、沉着是成功的一些最基本要素。几十年后,当我在进行高温、高压的化学试验时,黄先生的教导不是在起作用吗?

黄先生脾气暴躁,反右时被划成右派,以后又调去了外地,我曾多次寻找,不知在何处,有同学说他已经作古。周先生也早已调走,据说当时调去邻县中学。半个世纪后的2003年初,一位年青同事被上级派往赣州市任市长助理,我托他顺便帮我打听周先生下落,但无结果。年事已久,恩师难觅。但他们的教导,我仍记心中。

我的青少年时代得到了浓浓的亲情和师情。他们的品德对我的性格形成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恩情,使我终生难忘。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去对待我的孩子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学生们,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